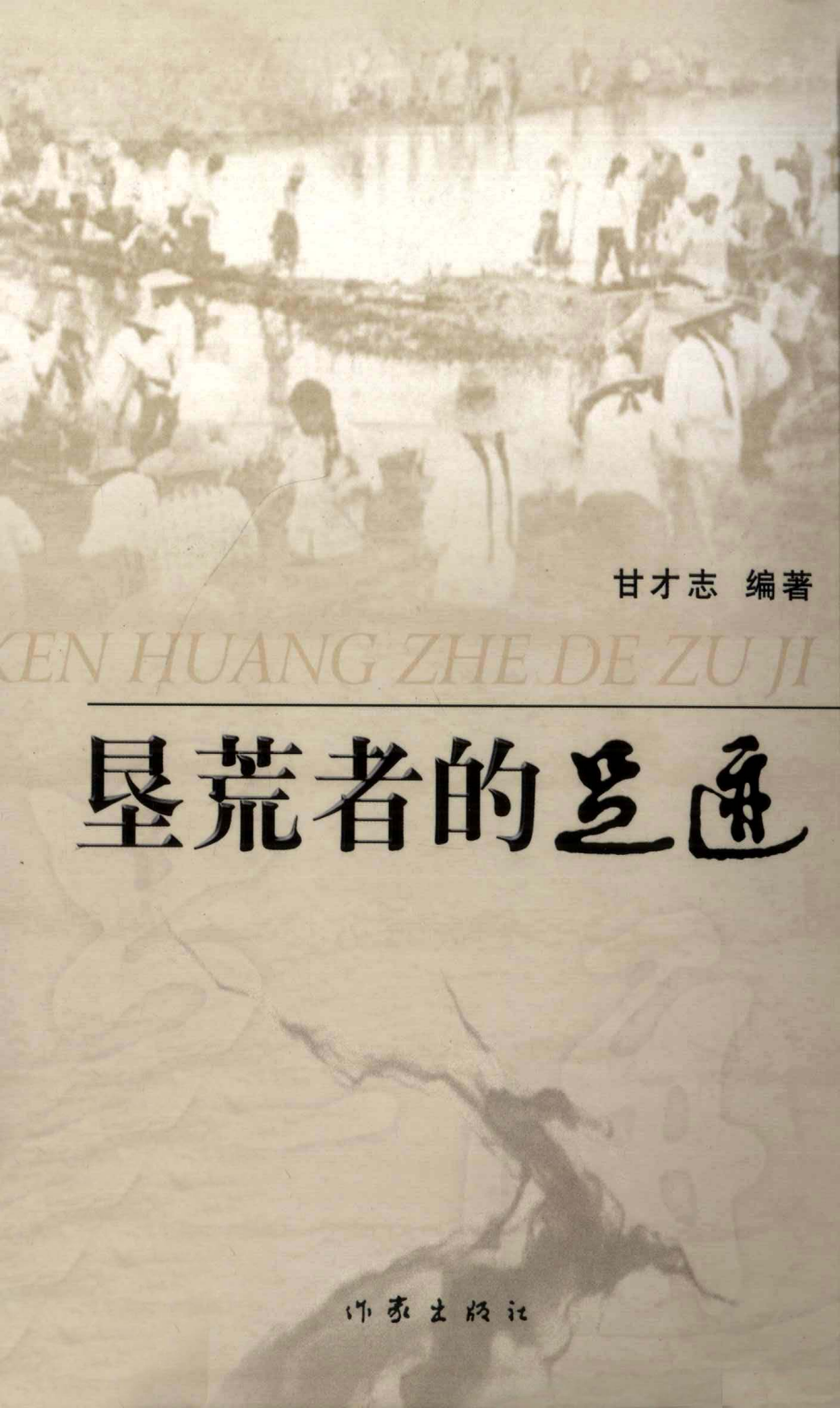




甘才志 编著

KEN HUANG ZHE DE ZU JI

垦荒者的足迹

作家出版社

垦荒者的
足迹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垦荒者的足迹 / 甘才志编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5063 - 4153 - 0

I. 垦… II. 甘… III.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3652 号

垦荒者的足迹

编著: 甘才志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通感工作室

出版: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0 千

印数: 001 - 2000 册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53 - 0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2008年5月18日，是八里湖农场建场50周年的纪念日。此前，总场负责人约我写几篇老一代农场人的回忆文章，编个集子，作为奉献给“场庆”的礼物。我欣然应允。倒不是我闲着没事干，更不是为了耍笔头，而是这个提议牵动了我的情愫，让我忆起往事一桩桩。

我是在八里湖出生的，属于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之一。1957年挑大堤时，我才5岁，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观看挑堤的人群如蚁般奔忙着。那时当然不知道有“壮观”二字，只觉得好玩、好热闹。更为稀奇的是在堤上碾来碾去的铁机械，冒着浓浓的黑烟，有人说那叫拖拉机，力气比十头牛还要大得多。听得我直咋舌头。

大堤挑起来后，我家也从堤外的管家围搬到堤内的高家垸，随之见到的事让我眼花缭乱。

先是看见一群穿着花格子衣裳的上海人来了，接着看见赶着马车的河南人来了，后来看见更多挑着箩筐的上乡人来了，



把个窄窄的坑子挤得满满的。我家隔壁是个油坊，白天木油榨摔得“嘭、嘭”响，晚上碾子四周还睡满人。两个月后坑子前面又盖起两栋黄瓦屋，湖中间建起新建排，成立了陈围大队。紧接着，一人多高的芦苇被垦荒的人砍倒，拖拉机牵着五铧犁和圆盘耙开来了，地被翻成“犁波子”，过些时就长出绿油油的萝卜菜。

人们欢呼着成立国营农场了。

不久成立了大食堂，吃“供给制”。于是在我头脑里就形成了拖拉机加萝卜菜加大食堂等于国营农场的最初概念。以后我在农场上学，劳动，参加过修路、平整、植树和建泵站等一系列活动，直到34岁时调离农场，家还留在那儿，直到现在，老来还想回去颐养天年。如今让我写农场的历史，就像年青时有个女孩向我瞄一眼似的，不回望她几眼还真的不舍呢。

于是我就试着采访了两个对象，都是建场时的老人。我原来还担心他们不愿意谈，或者应付了事。谁料刚挨上就被粘住了。这些建场时的老人啊，如今都是七八十岁，白发苍苍，颤颤抖抖。但是听说我是来了解建场历史的，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努力回忆着，一开口就有扯不落的话柄，生怕讲漏了，讲错了。让我感慨不已。这就是老一代的农场人呀！他们把青春和汗水洒在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让梦想变现实，现在老矣。我是在抢救呀！就感到身上的担子重，不断地记，写成最初几篇。写作过程让我改变了最初印象，国营农场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同吃一锅饭，同饮一河水，同流一身汗，把荒湖变成米粮川，把粮油连同子女送出去。如今留在场内的老人们就成了守望者，望着眼前的变化，把额上的皱



纹都笑平了。所以我就写得很起劲。

最初我列出一长串采访名单，他们中有第一台脱粒机的制造者，有第一座砖瓦窑的建设者，有查出第一颗钉螺的血防医生，有唱响两省三县高坑剧团的名角儿，有水库移民，有逃荒来的人，还有下放到八里湖的武大师生，等等。我想争时间抢速度，把这段快要被人遗忘的历史从老人们口里挖出来，写成书，让更多的人知道。遗憾的是，自己还在职，日常工作且多，加上不断的约稿，都得应付，就把计划打乱了，写几篇停下来又去忙别的，可谓手忙脚乱。

尽管如此，但我始终坚持写作的理念——纪实文学要纪实，不能虚构。这样，我先把初稿写成，交给当事人看，让他们提意见。对于同一件事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时，我就查资料，采访多个当事人。如农场第一台拖拉机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回来的？当事人叶信达讲是1958年3月18日，他拿着竹竿放鞭炮，记得很清。我查《八里湖农场志》上写是1957年11月，拖拉机手是桂坤山和严宝航，发现有误。我又查《蕲春县志》，记载“1957年冬，省农垦部门调拨给国营八里湖农场拖拉机6台，计248马力。”事情到此应该止了。但是我再了解，八里湖农场是1958年元月成立的，严宝航也是建场后才来的，叶信达讲的不能不信。我又走访写《场志》和为《县志》提供情况的汪浩，他讲自己是1957年10月到八里湖来搞筹建的，11月挑沿江大堤时用拖拉机碾压，所以他在《场志》上是这样写的。我提出叶信达的说法，他终于“啊”了一声，说1957年11月用来碾堤的两台拖拉机是省里调来的，由于农场未成立，先调到水利局修大堤，大堤修起来后归属八里湖，



那是在这以后的事。所以农场回来的第一台拖拉机应是1958年3月。又例如上海知青是什么时候到农场的，当事人钱湘江讲是1958年5月16日。我查《场志》是当年5月8日，便问是怎么回事？钱湘江摸摸头说回去翻日记再回答我。两天后他给我回了话：“5月8日在上海开动员会，5月11日在十六铺码头上船，14日到黄石港，15日到蕪州，16日到农场没有错，一共来的是321人。”

当然有些情况年代太久，资料不翔实，我就作了模糊处理。如1940年到1952年烂泥滩的乡保甲设置，当事人徐志祥讲烂泥滩属保，归西湖咀乡管，后归元峰乡管。另一当事人杜春友讲烂泥滩为甲，归寒管岚乡下属的寒管岚保管。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我查蕪春县民国档案，当时的政权很乱，国民党省府颁布的《乡公所组织暂行规定》，蕪春全县设乡40个，1944年并为27个，1947年并为10乡1镇，乡以下为保。如此推算，烂泥滩应先为保后为甲，具体年限也划不准，兵荒马乱嘛，所以我就按当事人的叙述写。诸如此类，也有几处，总归无碍大局，细心的读者瞧出来相信也能理解。

我是凭着这种态度来撰写这本集子的。原计划要多采访一些人，多写几篇，但时间不允许。转眼到了2007年末，离“场庆”仅隔4个月。我计算时间，交付出版社还要减去两个半月，剩下只有50天，怎么办？掂量再三，我就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利用上，以至在省里开会时还开小差跑回来，发疯时达到每天采访两人写近万字的高速度。抢，难免粗糙；不无遗漏，两难选择，最后只好缩短计划，春节前收笔，从头看一遍，润润色，用电子邮件发往出版社。



“包袱”卸下本应感到轻松些。谁知我搁笔后反而感到不自在，因为我曾许诺过要采访一些人没去采访，许多该写的人和事也没写上，在此只得一一致歉了。

以上是我写这本集子的全过程。

写作时，有朋友看见我眼睛熬得红红的，便叹着道：“何苦呢？搞得那样累。”我回答是“答应了人家的话。”心里想，苦也是值得的。写这本集子时让我对八里湖的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与老农场人有了更多的沟通，觉得他们虽然吃的苦多，有时还有些抱怨，但是都认为值得。汗水浇灌出的不仅仅是庄稼、果树、厂房与道路，还有思想与灵魂——人材也是思想与灵魂的衍生体。

所以我的结束语是：

付出的人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啊！

我也是。

2008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八夜）



目 录

垦荒者的足迹

自序	甘才志 1
烂泥滩旧貌	杜春友等口述 1
夕日的土门山	袁桂发等口述 14
目睹荒湖变良田	张柏青 29
我在八里湖的二、三事	汪 浩 43
亲历烂泥滩变迁	徐志祥 56
上海知青来场记	钱湘江 75
拖拉机开进了八里湖	叶信达 88
我在教育三十年	朱连峰 99
卫生事业初建成	张振玉 117
艰难开拓的头三年	张 宽 130
计划经济一支笔	陈友生 180
我在农场的日子里	陈继昌 192



烂泥滩旧貌

杜春友、高桂友、王云舟、杜光顺、高占法等口述

1949年前的烂泥滩呀，包括的范围可广呢，上至如今的双沟寄马山，下至蕲河老出口挂口渡，上下距离有十几里，宽仅一里余。上游的山为什么叫寄马山？叫了几十代人，没一个准确的说法。按老人的解释是，那时的八里湖是片荒湖，春夏两季水汪汪、白茫茫一片，没有人家，也没有牲畜，到了秋、冬季，洪水退了，这儿就是一个放牧场。不仅如此，古代还是一个天然战场呢。老年人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前就在此地打过多仗，满湖荒草，一马平川，能够摆开几万人的队伍，胜利者当然是威风凛凛，放马南山，失败者只能落荒而逃。当时在八里湖一带打仗的主要有朱元璋和陈友谅两支农民起义军队伍，双方厮杀数十仗，各有胜负，然后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再接着打下一次仗。寄马山就成了一方的安营扎寨地。史书记载，八里湖的东北边叫土门城，传说是朱元璋为打胜仗命令士兵用战袍兜土在一夜间筑起的土城。如果此说成立，寄马山一带无疑就是陈友谅部队的安营地。寄马嘛，是本



地人的土语，普通话讲是拴马的意思。照此理解，寄马山就是元末陈友谅队伍的大本营，只不过因为胜者王侯败者寇，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了，所以土门城就载入史册，烂泥滩则如沉水的石头，直到解放后才露出水面。

寄马山下游十几里的地方是古蕲河的入江口。史书记载也曾繁华过，还是楚国的商埠要地，汉唐时的盐商茶道呢，自然也是朝廷的阳关税道。至于为什么叫挂口，史书没记载，老人也没解释，不过按当时烂泥滩和蕲州府之间的地形而言，现在分析挂口其实是“褂口”的别音。“褂口”是衣服的领子，过去人穿的对襟衣服是从右侧边开口的，扣得很紧，只有两个袖口和一个领口通向外面，袖口是支，领口是主，所以把领口称褂口很自然。如此比喻蕲河，也有三个出口，从南征湖经赤西湖到岚头矶是个出口，称不上主流，从红头湖经雨湖到王宣也是一个出口，也称不上主流，唯有从白河流经土门河穿过八里湖的这条河道，又从龙凤寺和牛皮坳两个地方越过山坳会合后流向长江，形成主河口，所以被老人们称之为“褂口”，而岚头矶和王宣两个出水口则隐喻为“袖口”。至于没有叫出名，过去的人也许因为“袖口”的位置比“褂口”的位置显得低，叫出名后担心影响那里人的情绪，所以避而不叫。我们从小只听说过“褂口”，老人们说叫了几百年，所以约定俗成了，名称的由来谁也没去考究。后来《蕲春县志》也只说这儿叫“挂口”，我们理解那是写志的人的笔误，本应叫“褂口”才对。

至于挂口河与寄马山之间的一块滩涂为什么叫烂泥滩？完全与这儿的地理位置有关。八里湖在解放前并不叫八里湖，而



是被分别叫成许多个名字，有徐角湖、董家湖、大腊湖、细腊湖等，秋冬季洪水退去，各个小湖就露出来了。春夏两季水涨起来后，各小湖又连成一片，统叫“大湖”。湖的位置低，解放后测量的标准是吴淞口海拔 14 至 16 米，唯有长江边一个狭长地带高出湖面四、五米，海拔达 20 至 22 米。也就是说，春夏两季涨水，江里是水，湖里也是水，唯有江、湖之间这块滩涂还露在水面上，自然就成了过往船只和本地渔民、农民的栖息地。长江涨水年年有，但是要涨到 22 米以上的年份就不多，所以每年涨水季节，唯有寄马山到挂口这块滩涂未被淹没。到了秋、冬季，洪水退去后，湖里是烂泥，滩涂是干的，烂泥滩因此而得名。

如此说来，烂泥滩、挂口河、寄马山一带的地名都是上上几辈人随口叫出来的，没有文化，也没载入正史。正因为如此，才体现了烂泥滩这个地方的特色。

烂泥滩什么时候开始有常住人口也无考证，现在的高家垅最早住的是姓高的几户人家，老人们回忆住了 15 代。15 代人前是从彭思长塘搬过来的。解放前按 20 年一代人计算，高家垅的高家祖宗也应是在清代康熙年间搬过来的。在这之前究竟有没有人住，谁也不清楚。不过，史上记载“挂口”河自古便是商埠要地，想必那时的烂泥滩也并非无人居住，不过后来几经战乱、屡遭灾害，连与“挂口”河紧邻的蕲州府也成灰烬，蕲春的人口大都是从江西等外地迁过来的，那时即使烂泥滩有人住，到了明末清初时也该绝迹了。

前面说过，烂泥滩是个狭长地带，两头低中间高，为了抵御每年必遇的山洪和江汛，这里的居民就组织起来挑围子。所



谓挑围子，无非就是两只箢箕一条扁担，外加一个肩膀两条腿，把土从低处往高处挑，形成一圈堤，堤内就叫围子。首先挑起来的是管家围，也就是现在的高家垸至蕲河新出口的这一带。既然是叫管家围，肯定很早以前是由姓管的家族人挑成的。但是到解放时，管家围一带既没有姓管的人住，也没有一个被称为“管家墩子”的地方。由此推理，姓管的家族开始挑了一个很小的围堤，以后便迁走或灭迹了。解放后，管家围一带 10 个墩子有人住，从上往下数，依次是刘家墩、丁家墩、徐家墩、甘家墩、吴家墩、杜家墩、上张家墩、下张家墩、上黄家墩、下黄家墩，还有几个墩子无人住，都是在解放前几十年因患血吸虫病而绝户的。上面说的 10 个墩子，最大的是吴家墩，住着 5 户，其中 4 户姓吴，1 户姓冯，其次是杜家墩和上黄家墩，各住 3 户本姓人家，其余的墩子都是住一两户。管家围也就是 20 来户百十口人，分布在 3 华里的狭长地带。

从管家围往下走是高家垸。

解放时高家垸有 20 户人住，算是一个大垸下。其中高姓 13 户，张姓 5 户，傅姓 2 户。高家垸下面半里路远是夏家垸，住有 6 家人，其中王姓 3 户，夏、余、徐姓各一户。夏家垸下面是杜家垸，22 户都姓杜，是烂泥滩最大的一个垸。杜家垸下面是王家垸，有 12 户人住，王姓 8 户，其余几户是杂姓。王家垸下面是十里铺，只住姓甘的一户人，靠捕捞和“做业”（即捕鱼的意思）为生。由于住在江边，常遭强盗抢劫，所以姓甘的上人给儿子娶了一个会武功的媳妇。该媳妇是阳新县柯家垸人，几代人习武，称得上世家，媳妇人很精干，蓄双大脚，与那个时代的女性不一般，但是很会武功。据传刚嫁过来



时，甘姓后生还不知道媳妇的厉害，常用旱烟袋窝敲她的头，开始她忍着，后来忍不过去，一把抓过丈夫的烟杆子甩到门外去。丈夫躁上前来，又被她轻轻一提摔到门外的臭水沟里。还有一次是甘姓后生坐在脚盆洗澡，吼媳妇添水，媳妇迟了点，后生就挥拳头。谁知这下把媳妇惹急了，轻轻走过去连脚盆带人将后生端到门外。经过此两次，甘姓后生知道媳妇的厉害，从此惧她三分。还有一次是半夜时分，江边来了一只船，在十里铺停靠后，下来十来个人，拿着棍棒敲开甘家的屋门要搬东西，甘家的男人躲在一边不敢吱声，媳妇顺手捡起一根芒槌，对着强盗讲，你们有谁能把芒槌接过去，屋的东西任你搬，连我也行。几个强盗都来试，没一人抽的动。后来为首的强盗抡起棍子打，甘家媳妇用手中的芒槌轻轻一挡，强盗的棒子全脱了手，尝到厉害后这群人便灰溜溜地逃走了。甘家从此再也没遭抢，独户人家在十里铺住到解放后。

十里铺以下是高山。名字虽然高，其实山不高，只有三四十米。之所以叫这个名，可能是它立于大、小腊烛湖之间，湖的位置低，衬出来的山就高。高山也分几个墩，解放时住5户人，都是在民国二、三十年间从外地搬来的，再以前的老人早就绝迹了。

以上是烂泥滩的全部住户，总共有近八十户，三四百人，日伪时期隶属于茅山区寒管岚保，烂泥滩为甲。当时的寒管岚保就是现在的管窑镇一部份，保长是高立贵，据说是共产党派来的，明里为日伪政权服务，暗地里帮共产党。高立贵原来不是高家垸的人，当上保长后从外地搬到管家围下张家墩住。他一来就组织人挑围堤，为老百姓做些好事，所以烂泥滩的人至

今还念他。保长之下是甲长。烂泥滩近百户人就是一个甲，甲长的任务是派夫派粮，本地人的话是“光做恶人头”，没有人愿当。高立贵见此情况，就说“恶人头”不能让一个人做，大家要轮流。如果都不做的话，日本人来了没一个出面的人，他们就家家搜，户户抢，怎么得了？高立贵说完后，大家想想也只有这样办，所以每个垵派一个人轮流当，每人当一个月转。

烂泥滩由于紧靠蕲州，日本人的汽划子来得快，一溜烟就开来了。一来就找保、甲长，一是要粮，二是问有没有共产党。现在的老年人记得遇过两次险。一次是1942年农历5月，也就是端午过后不久，日本人的汽划子在管家围停下后，下来十几个日本兵，背着三八大盖，后面还跟着三、四个穿着黑红制服的“茄子队”，手里拿着绳子，让高立贵保长和江柯发甲长通知全甲的人统统集合在高家垵。等大家到齐后，“茄子队”就把黄赐红和杜中杰两个人拉出来，“茄子队”中一个为首的人挥着手枪说：“老乡们都听着，做皇军的良民都没有事，跟皇军作对的人决没有好果子吃，这两个人就是样子，皇军要审他们。”说完就动手，两个“茄子队”兵捆一个人，日本人拿着刺刀顶着老百姓，大家不敢做声。在这之前，烂泥滩的人都知道杜中杰是算命先生，黄赐红是“汉流”老九，也就是活跃在汉口至九江一带的群氓组织。黄赐红是寒管岚保的头，按“汉流”组织规矩排行第九。“茄子队”是为日本人效劳的中国人，也就是外地人讲的汉奸，他们仗着日本人的势力耀武扬威，深遭老百姓痛恨，当地人称他们是豇豆藤上结辣椒——变了种。由于他们穿的制服黑不黑、红不红，像“茄子”

的颜色，所以老百姓就叫他们“茄子蒂”，后来演变成“茄子队”。“茄子队”的人由于情况熟，对待老百姓比日本人还凶。他们把杜中杰和黄赐红捆起来后，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两人拒不承认。为首的“茄子队”朝日本兵一咕噜，挂着战刀的日本人嘴角一挑，“茄子队”就把杜中杰和黄赐红吊到树上，一顿毒打，再问，两人还是摇头。再毒打，直到奄奄一息，日本兵才让“茄子队”把他们放下来，拖到江边上了汽划子。过了两天，杜中杰被住在竹林墩的本地绅士张灵波保了出来。黄赐红没人保，半个月后，抬回来的是具尸。至于张灵波为什么保杜中杰而不保黄赐红，据说杜中杰是一个真共产党，还是西湖嘴乡的党支部书记呢，他以算命作掩护，到处联络贫苦群众，给共产党办事当耳目。他被抓去后，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徐光道做张灵波的工作，出面花高价把杜中杰保了出来。杜中杰是个厚道人，被保出来后，自觉欠了张灵波很大的情，恐防下一次又被抓去，又要张灵波去赎，所以出来后与徐光道断了联系，又去算命，共产党的书记也不做了，算是脱离了党组织。这样一直到解放后。土改时工作队说要送他去劳改，他找徐光道，免了牢狱之灾。但是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他还算命，说“大食堂吃不长，天将降大灾于斯人也”等所谓的反动话，被人检举到上面，县公安局就以长期宣传封建迷信，散布反对社会主义言论的罪名判了他20年徒刑。1978年放出来后仍住在高垵，这时开始改革开放了，算命不算犯法，杜中杰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高垵的老人都相信他，找他算命和治病的人不少，他就靠收几个小钱过日子。至1980年病死。

另一次是1945年农历3月，正是麦苗儿青菜花儿黄的季



节。日本人的汽划子又开到外江涂（外江滩涂的简称，以前本地人都是这样叫的，指从十里铺到管家围这一带的江岸），日本人和“茄子队”下来后，直闯高立贵家。高立贵家没人，“茄子队”摔几枪托子把门砸开后，就在屋里搜。一会儿搜到几份共产党宣传提纲。日本人见搜到了证据勃然大怒，找来一桶洋油（即煤油），要放火烧房子。那时的高家垸可不是现在火砖砌的屋，一半是土砖一半是茅棚，还有的是用木板隔的房子，只要一间被烧着，那就是火烧连营了，全垸户户都遭殃。见此情况，当地的富人头子徐西夫（又名徐胖子）出面说话，要求“皇军”高抬贵手，高立贵联络共产党是他个人的事，不与全甲良民有关系，若是将高家垸二十几户全烧了，那么今后谁来为“皇军”交粮纳税呢？“茄子队”把这句话译给日本人听，日本人咕嘟几句，“茄子队”问徐西夫：“哪你说怎么办？”徐西夫也不含糊，回答说：“我说只烧高立贵一家。”“茄子队”问怎个烧法，徐西夫说：“古人讲，曹操割发以代命，我们是不是能仿效？把高立贵屋里的东西搬出来，在他们门前点把火全烧了，这样以儆效尤。”“茄子队”把这句话译给日本人听，日本人点点头，他们就吆喝众人把高立贵家里的东西搬出来，码在门前道场上点火烧。高立贵的爱人是开杂货店的，东西较多，搬出来的大多是商品，如箩筐、簸箕、香纸、灯草，还有发饼、芝麻糖、豆腐泡等，火烧得冒黑烟，很远的地方都看得见。高立贵的爱人跑回来，见是烧自家的东西，正要冲上去问个明白，被徐西夫用目光拦住了。徐西夫随后说：“乡亲们都看见了，皇军要抓的是高立贵，他与共产党串在一起，与大家没关系。今后谁要发现了高立贵通共匪，就马上报

